

玄学思想与魏晋文学思想

宋 博

(南宁师范大学, 南宁 530000)

摘要:作为一种与正统经学相关联的思想观念,玄学思想活跃于魏晋时期,对魏晋文人和魏晋文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思想文化与文学观点的研究视角看,魏晋文学的发展与玄学思想密切相关。玄学思想的体现使这一时期的诗赋作品呈现出玄理化、抽象化的特点,内容充斥着《老》《庄》《易》“三玄”的痕迹,篇章中具体物象的出现,也有着强烈的玄理目的。诗作家、赋作家的作品在讨论、交流过程中催生了玄学思想的深度交融。

关键词:玄学;玄学思想;魏晋文学;玄言诗;玄言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4)04-0165-04

DOI:10.16721/j.cnki.cn61-1487/c.2024.04.039

Metaphysics and Literary Thought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Song Bo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0)

Abstract: As a kind of ideological concept associated with the orthodox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metaphysics was active in the Wei and Jin period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iterati and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culture and literature viewpoint, the development of Wei-Jin literatur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metaphysics. The embodiment of metaphysical thought made the poems and *Fu* (a form of Chinese rhymed prose) of this period have the metaphysical and 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ntents were filled with traces of the “three metaphysics” of *Laozi*, *Chuang Tzu*, and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emergence of concrete objects in the chapters had strong metaphysical purposes. The discussion and exchange of the works of poets and *Fu* writers give rise to a deep fusion of metaphysical thoughts.

Keywords: metaphysics; metaphysical thought; Wei-Jin literature; metaphysical poem; metaphysical *Fu*

为什么会产生玄学思想?目前有两方面解读。一方面,魏晋士人受汉末清议^①影响,尚清谈、任达、飘逸、狂放,评价对象由人转为自然,以表达他们对政事远离的决心;另一方面,部分士人玄谈名理,高谈人生道德,以新的哲思解读经学。不论是哪一方面的解读,玄学思想都与士人群体相关联,鉴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玄学是在时代发展的要求中产生的。王朝迭选,士人需要新的信仰以安置自己痛苦的精神,政权的建立需要新的思潮以处理国家与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社会思潮在汉代经学之后需要新的发展方向,这一系列的原因推动魏晋时期迎来玄学这一代表性的思潮。

作为经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玄学是伴随着经文发

展而产生的一种思想新变。“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1]找到能解释诸事件的最高原则,进行抽象化合理化的解读是玄学的重要特点。它的思想路径是用玄的观念对经进行解读、对世界进行认知。

玄学思想在魏晋时期的发展演进轨迹如何?它对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可以将魏晋玄学思潮的演进分为四个时期: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时期;以嵇康、阮籍、向秀为代表的竹林时

^①汉末清议:清议是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的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这些官僚士大夫以太学为中心,希望通过“清议”,表达自己对现实统治的不满,希望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来挽救外戚和宦官专权下走向覆灭的东汉王朝。

期;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以道安、张湛为代表的东晋时期。

一、魏晋玄学的发展

汉末至魏晋以考核名实和辨析名理为主要内容的名理学,产生于选官制度和人才辨识理论,名理家核查名实以考察人才。之后,随着朝政的腐败和世风日浊,名理中对于人物的品评也从道德唯举加入了才性、风姿等方面的评价标准。人物评论从以选官为目的的清议到其后的清谈,功利性色彩减弱,审美性增强,由察形观实上升到对人物才性一般性规则的探讨。刘劭《人物志·九征》云:“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人物志》的人才问题不再是拘泥于问题本身,而是与其他问题发生关联,这一过程是士人们思维转变的过程也是品评思维转向哲学思辨的过程,加快了士人从人物评论转向对玄学命题的探求。这种转变是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重要过渡阶段。

“玄”取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对道“有”“无”的一种指称,到了正始时期,士人们将“玄”的解释上升为宇宙观念、哲学概念,并推动“宇宙发生论”向“宇宙本体论”发展。《晋书·王衍传》谓“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王弼、何晏拉开了正始玄学思潮的帷幕,并借助于当时被称为“三玄”的《周易》《老子》《庄子》推广玄学。

正始玄学在“三玄”的基础上,提出和深化了“无”本论,由“无”阐发了关于“言意”“动静”“名教与自然”的问题,为玄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针对名教问题,王弼论述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是本,“名教”是末。他主张“自然”为本,“名教”为末,崇本贵无。

竹林时期的玄学家们继续探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嵇康与阮籍将“名教”与“自然”割裂开,并提出“任自然”的主张。向秀认为,万事万物都应当依据自己的本性表现,满足自己所存在的条件,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统一。

西晋时期名士名义上响应嵇康、阮籍的主张,但表达形式大有不同,行为惊世骇俗、流于表面。同时,士大夫清谈主题和内容远离朝政,崇尚“自然”并不能维持统治者政权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在这一局势下,“名教”的存在被得以肯定。

元康时期,裴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乃著

崇有之论以释其蔽”^[2]。他的“崇有”论意图通过以有为本体建立内圣外王的“道”。郭象主张“独化”,认为万物自生,自我变化,“天地亦无心而自动”,他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试图回到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和谐。

东晋时期,士人经历王朝颠覆,流离失所,痛苦情绪急需宣泄。士人们对于“人”作为社会的独立意志的认识愈发深入,天地本源、人生来去、存在与认识等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逐渐引发士人与佛学者共同探讨,“名人释子共入一流。”^[3]道安将般若学的“有者谓万物,无者谓空”与《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结合起来,利用佛教道义与士人们清谈论议。张湛在郭象“独化”论基础之上,吸取般若学的道义,将玄学的辩证体系发展得更加完备。

魏初的名理之学,到“有”“无”本论的中和,再到佛学思想与玄学思想相融合,这其间魏晋文学创作的变化与玄学思想的不断发展是不能分开的。

二、玄学思想与魏晋诗歌创作倾向

魏晋玄学思想方法是由言意之辨引出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称:“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通过“言”对“象”的描述以达“意”,只有透过对“象”的表述而忘掉“象”,抓住本质的“意”,才能得到“意”,故主张“得意忘言”。

对“言”“意”的辩论,抽象与现实的探寻,哲学推衍与艺术表现的转化,构成了玄学思想方法。“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才是典型的、完全的玄言诗。”^[4]

(一)玄言诗的发展历程

玄言诗发端于西晋。作为正始玄学的领袖,何晏对玄言诗进行初步尝试。何晏诗歌具有玄风却不属于玄言诗,他所流传下的《言志诗》二首中,虽有“鸿鹄”“太清”“清池”等玄学意象,并在诗歌中流露出“逍遥”飘转之意,但其追求“逍遥”“顺流”是因担忧未来之危势,与玄学诗于世间万般变化中独求淡泊中和是有区别的。但从咏常见之物言玄理的角度来讲,何晏为玄言诗的形式定型奠定了基础。阮籍与嵇康分别在玄言诗的“言”“意”把握与自然景物对玄意领会的启发方面产生了推动作用。

东晋初期,玄谈之风延续,《世说新语·文学》载,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王导身居高位且尚“无为而治”,对于东晋玄学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檀道鸾《续晋阳秋》记载:“郭

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郭璞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游仙诗》在游仙诗本身叙写人物、景色之余又增添了对玄理的述说。例如,《京华游侠窟》一诗,在写明俗事繁荣不如归隐的意向后,举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然后用《周易》“乾”与“大壮”两个卦象叙说自己对人生的思考。“游仙同味玄的结合”是郭璞玄言诗的独特之处,用概括性的景物来表达玄理更强化了玄言诗的发展方向。

玄学时代能够集中讨论玄学,辨析玄理的场合之一就是诗会。东晋王羲之举行的兰亭诗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不仅流传了专门的诗作,且人群更为丰富——士人与僧人一起论玄,更在诗歌中互相阐明玄理或者通过观点交流达成审美技巧的提升。钟嵘《诗品》所称“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中的孙绰也参与到此次兰亭诗会之中,并作《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隼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这首诗歌自然优美,在动态的美景中体悟玄理,“物触所遇而兴感”^[5],可以说是当时兰亭诗会上优秀的诗作。

晋宋之交,玄言诗进一步对景物的描写概括化、抽象化,陶渊明与谢灵运将对玄理的理解与自然景物产生了新的关联,玄言诗也由此走向终结。

(二) 玄言诗的特点

1. 概括化、抽象化的手法

玄言诗使用概括化、抽象化的手法对自然景物进行描写,旨在传达感受,使读者领会真正的“意”。对玄理的交流探讨是玄言诗发展的主要目的。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皆可对玄理的体悟有所推动,故除纯粹讨论玄理的诗歌外,诗人们常结合自然景物阐发玄理。玄言诗无论是在初期的尝试阶段还是末期向山水诗、隐逸诗方向的转变阶段,其本身对于“三玄”的阐发是以传达个人在生活中目之所及的感受为前提的。见自然而抒玄理是玄言诗要传达的意图之一。

2. 玄言诗崇尚“中和平淡”

玄学以“三玄”为基础阐述哲理,以玄学的态度来对待玄理,会感觉“意”在“言”外,以玄理看待人生,更觉超越凡世而得逍遥。卢湛在《时兴诗》中面对随时间流变而产生的悲景,感受到了“恬然存玄漠”;王羲之在暮春时节书《兰亭集序》“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不同

的环境,不同的景色,不同的诗作氛围,相同的是能够在自然景色中体悟到玄理。在这样的境界中,平和恬淡是景物本身的特质,它作为一种媒介,使诗人与玄理境界产生一种联系。

3. 诗人通过玄言诗表达自己的玄学人格

文学作品是文学家人格的文本载体,透过玄言诗能够看到的是人的玄学人格精神。玄言诗发展初期的诗人们在悲剧的环境下,处于生死、出世入世的挣扎矛盾中,诗歌也显现出对玄理境界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哀告、愤慨。如嵇康的《五言诗》中既有“慷慨之远游”中对美好境界的向往,又有“哀哉世间人”的控诉与忧愤,这样的挣扎是与嵇康的现实遭遇分不开的。东晋时期的玄言诗呈现出平淡的味道。诗人们“游心于淡”更“顺物自然”,对山水的描写不仅采取静观的心态,且借助山水的幽淡来消解他们“死生亦大矣”的内在焦虑。诗人们的人格与诗性相结合,玄学人格借由玄言诗而表达^[6],这构成了玄言诗的独特魅力。

三、玄学思想与魏晋文赋创作倾向

“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7]刘勰此说概括了赋体的主要特点。玄言赋能够在赋体讽谏、言志的主流表现外,承继魏晋玄学对“三玄”释读中的老庄适情任性、崇尚自然的精神,以玄言说理入赋,侧重玄旨的传达。赋家们把玄远超脱的理想人格作为现实的人生追求。

(一) 玄言赋的发展历程

玄言赋的生成与玄学的兴起有关,但其产生稍落后于玄言发展。就现存魏晋赋而言,正始时期何晏的《景福殿赋》虽杂有玄学思想,但全篇以歌颂都城为主要内容,达成颂扬的目的,是玄言赋的萌芽时期。

竹林时期的玄言赋开始表达赋家的玄学主题,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描画了一个反对传统的大人先生形象,抛弃名教为了达到“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的境界,充分体现了阮籍超越名教以追求广大自然的人生情趣。

西晋时期,国家动荡,士人们把玄学思想作为一种手段,意图从中获得处世之道,远离祸患,保全自身。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类型如咏物类玄言赋、隐逸类玄言赋以及纯粹说理的玄言赋。

咏物类玄言赋托物以表现虚无超然的玄学处世方式,如孙楚的《扶杜赋》借扶杜“不施于器用”又“华叶疏悴”,却能达到“齐万物而并生”的道理,传达玄学

“贵无”的人生态度;《井赋》由井感悟玄理,对井“抱瓮而汲,不设极引”的质朴表示赞扬,于自然之物中体会到尚自然的玄理。

隐逸类玄言赋托“幽人”以寄老庄玄思。晋人用隐逸体玄,在对隐逸生活的描述中加入玄学思考,如陆机《应嘉赋》刻画了一位“体逸怀遐”的隐士公子,“抱玄景以独寐,含芳风而寤语。”在自然中遗弃物外的拖累,达成无我的自然之境,强调心灵的适性逍遥。

纯粹说理的玄言赋中没有隐喻,不含情绪,只注重对玄理的探讨,这其中典型的是庾敳所作《意赋》。“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对老庄齐万物、等生死的观念抽象地论述,在有意无意之间表达对自然的向往之情。

“自建武暨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8]可以说,东晋时期是玄言赋的发展黄金时期,赋作有了新的方向,同时出现了既能论玄又精研佛理的赋作家,如孙绰。以其《游天台山赋》为例,“太虚辽阔而无阂,运自然之妙有,融而为川渚,结而为山阜。”孙绰将川渚山阜作为自然的外在表象,在登山中体悟适性的玄理,“散以象外之说,畅以无生之篇。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从“有”“无”之间感受自然的意境,利用“色”“空”等佛教用语表现老庄的虚无,这是孙绰山水玄言赋的新义。

(二) 玄言赋的特点

第一,玄言赋多借助《老》《庄》意象对玄理进行阐发。玄言赋借用“三玄”中的意象阐发玄理,张华的《鹪鹩赋》取自《庄子·逍遥游》中“鹪鹩巢于深林”中的鹪鹩形象,写鹪鹩因“形微处卑”“不为人用”而“物莫之害”,故得翩然自乐,生息繁衍,实写无用获全的处世哲学。见《鹪鹩赋》而有所感的贾彪借用《庄子·逍遥游》“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形象,作《大鹏赋》谈“祸福之机”。玄言赋的论述中展现了文士极具思辨的语言特点,用词绝妙,短短数语就可令读者意会作品观点。

第二,玄言赋对自然物象进行玄理解读,通过人物寄托追求,重点论述理想的玄学人格。玄学家从自然现象中选取能够表现“玄心”“道意”的物象,借自然之物而论玄理,如孙绰《游天台山赋》将自然山水与“道意”相结合;王彪之《水赋》将水与《老子》中“以弱

胜强”的道理相结合。同时,对于赋作中主人公的形象塑造,赋作家常采用透过人物形象,描摹精神境界的手法,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塑造了一位超脱逍遥的至人、真人形象;陆机《幽人赋》塑造了一位世俗凡尘之外的逸群公子。赋作家在展现所描绘的对象的精神感受中侧重心境的描写,在物象虚化中表达自己的玄学人格追求。

四、结论

文学发展并非孤立、静态的,它根植于时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时代的动荡和玄学思想的发展引发了魏晋文学的变化。玄言诗、玄言赋作为受玄学影响而产生的文体类型,是魏晋士人群体受玄学思想影响的产物,寄托士人的政治理想,展现了士人塑造的理想的人格期待,表达了士人群体意图回归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达成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的文学尝试。

玄学思想与魏晋文学相辅相成。玄学思想体现这一时期的诗赋作品中呈现出玄理化、抽象化的特点,内容充斥着《老》《庄》《易》“三玄”的痕迹,篇章中具体物象的出现,也有着强烈的玄理目的,这是极具魏晋的时代烙印的,也是与其他时期的同类型问题相比最大的不同。同时,诗作家、赋作家的作品在讨论、交流过程中催生了玄学思想的深度交融,玄学思想发展末期的玄佛合流也与作品的流传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 [1] 汤一介. 汤一介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2.
- [2]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041.
- [3]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25.
- [4] 胡大雷. 玄言诗研究[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9.
- [5] 严可均. 全晋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808.
- [6] 李建中. 玄学人格与东晋玄言诗[J]. 江海学刊, 1999(1): 166-170.
- [7] 刘勰. 文心雕龙[M]. 范文澜,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134.
- [8]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43.

作者简介: 宋博(1995—), 女, 汉族, 黑龙江哈尔滨人, 单位为南宁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 杨超)